

交行夫妻员工私吞客户2亿资金潜逃 警方追捕1年未果

近日,一则“交行一对乐清小夫妻员工私吞2亿元资金逃跑”的微博在网上传开,发帖人“乐清草根资讯”表示,前几天偶遇一位衣着亮丽女士在贴告示寻找张丽跟胡海挺夫妇,该女士声称“这两口子,是交通银行的,私吞客户2亿资金,就知道他们躲在上海!”

小小支行的客户经理,真能撬动2亿元的巨额资金?

弃房弃车玩失踪?

记者致电交行温州分行办公室主任陈峰,陈主任告诉记者,张丽原先确实是黎明支行的员工,但已经于2011年10月份离职,并且之后再没有露面。

“张丽非法集资的事情我们也有所耳闻,她跟爱人胡海挺早就销声匿迹,今年都没有出现过。”陈主任透露。

对于张丽利用银行信誉,私底下从事资金中介,甚至非法集资和融资业务的说法,陈主任予以了否定:“她这是个人的非法集资、融资行为,跟交行无关,就连胡海挺向交行贷的款也一直没还。”

胡海挺向交行温州分行贷款未还一事,记者从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处得到了证实。

鹿城区人民法院刊登在《温州都市报》(2012年02月09日)上的公告显示,胡海挺曾分两次分别向温州交行贷款600万元、74688.48元并逾期未还,法院判决将张丽、胡海挺共有的坐落于汇源路绿洲花园4幢804室的房产以及浙C1Q537宝马轿车拍卖,温州交行具有优先受偿权。

“胡海挺当初向银行贷款,有房子跟车子做抵押,我们才贷给他。但自从张丽离职之后,两人一直没有露面。”陈主任向记者表示。

非法集资近2亿元

难道仅仅是6074688.48元的贷款让这对有房有车的夫妇“山穷水尽”?一位曾参与张丽集资放贷的温州企业主向记者揭露了背后的真正原因。

该企业主化名“孤掷一剑”在网上某论坛发帖,声讨张丽骗取数十个交行客户的近2亿元巨额资金卷款潜逃。

“她当初跟我们说,把钱存在交行,利息比其他银行高;并且交行有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收益远比普通存款高;想赚额外收入的客户,她还能以极高的利息贷给下家,本金利息都是月结,并且资金的来龙去脉都在交行的账户里,一清二楚。”“孤掷一剑”向记者透露,张丽开出的利率相当诱人,并且有几个朋友也参与其中,他也就相信了,倾尽了家产交予张丽。

“一个鸡蛋看起来不诱人,但一篮子鸡蛋凑在一起,张丽就动心了,我们怀疑她的出发点就是把钱凑起来,没打算还我们,现在联系不到她,也没个说法。”

记者拨打了寻人启事下方的联系电话,接线的是温州本地的陈先生。他向记者表示:“2011年10月,我们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局于当月底立了案并实施追捕,但到现在也没音讯。”之后,记者向温州警方求证,的确已经就此非法集资案件立案并上网追捕。

陈先生还透露,受害的总共有30多人,被骗金额从100万到1000万元不等,他自己就被骗了720万元,按照受害人的统计,张丽的确卷走了近2亿元存款。目前,他们已经成立了“债主委员会”,专门探讨应对此次受害事件。

当记者问及为何陈先生会轻易上了张丽的集资圈套时,陈先生的回答令人吃惊:“张丽是交行10多年的老员工,平时联系我夫人投资理财产品都是用交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谁曾想到她是在非法集资。”

“温州交行说张丽在去年10月就离职了,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

“我们当然知道,但张丽不是自己离职,而是在东窗事发之后被交行开除的。”陈先生对张丽是主动离职的说法予以了否定,“张丽集资被我们发现,从银行‘离职’,我们向公安局报案都是在去年10月。”

(摘自《浙江在线》文/程高赢)

人民日报:我国社保缴费率并非全球最高



近来,社会上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一些争论。如何评价一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划不划算、有无必要?世界各国对退休年龄是如何规定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会不会崩盘?如何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优化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日前,网上有传言称“中国社保缴费全球最高”。人民日报“求证”栏目记者就此约请驻外记者调查部分国家社保支出与国民享受社保待遇情况,并采访了有关专家。

疑问一:中国社保缴费过高吗?

社保名义缴费率在173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列13,有降低的空间

针对传言,记者采访了传言当事人、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他告诉记者:“网上传的‘中国社保缴费全球最高’不是我的原话,有些意思也有曲解。”白重恩说,根据有关研究统计,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这一比例超过了大多数国家。

对此传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告诉记者:“一些地区、许多单位并非按参保者的实际收入而是以其基本工资或底薪作为缴费基数,也就是说实际缴费率较名义缴费率要低得多。”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褚福灵告诉记者,社保缴费率是指雇员和雇

主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总额占个人工资的比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148个国家的统计,以养老保险为例,我国雇主缴费率为20%,有20个国家的雇主缴费率大于等于20%;我国个人缴费率是8%,有38个国家的个人缴费率大于等于8%。因此,即使从名义缴费率来说,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也并不是最高的,处于中等偏上的区间。

本报记者同时查阅了世界银行、OECD(经合组织)有关资料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0—2011)》发现,中国社保缴费率不是最高,但的确处于较高的水平。记者还查阅美国社保局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发现,在173个国家或地区中,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哥伦比亚、捷克、匈牙利、法国、奥地利、荷兰、德国、意大利、波兰、乌克兰等12个国家的社保名义缴费率高于中国。

“但我国社保名义缴费率具有调低的空间。通过统一规范缴费基数、提升社保统筹层次、合理化解历史负担(如国有资产弥补)等,名义缴费率可以降低6到10个百分点。”郑功成指出。

疑问二:社保缴费率越低越好吗?

缴费率关系到保障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合理

社保缴费率是否越低越好呢?“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在劳资分

责、政府担保的基础之上,一定的缴费决定着一定的保障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合理。费率过低不足以解除参保人的后顾之忧,而费率过高又会直接加重用人单位与参保人的负担并损害代际公平。例如,从各国实践来看,多数国家的养老保险替代率(指退休后养老金占退休前个人工资收入的比例)为40%左右,缴费率以20%左右为宜。”郑功成表示。

“如今,过度的福利和慷慨的保障已使欧洲福利国家不堪重负。以希腊为例,其社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畸高,仅次于以石油立国的沙特和2008年底濒于破产的冰岛。这种制度设计超出了希腊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能力,成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中国社科院教授郑秉文告诉记者。

本报驻外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国家的高福利,往往建立在较高税收或高缴费率的基础上。例如,意大利养老金的替代率为70%,其缴费率也高达32.7%。而在有的国家,由于缴费率过低,民众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如在南非,养老保险缴费率较低,养老金替代率仅13.1%,很多人退休后难以得到足够的养老金。

专家们表示,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应该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各国政府都应当理性地考量负担均衡、待遇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中

国宜奉行保基本的建制目标并将缴费率维持在一个合理区间。”郑功成说。

疑问三:如何看待我国社保水平?

已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络;但仍需提高保障水平

8月2日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出台了20多项社会保障政策规定。9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人群已超过7亿人,70%以上的目标人口拥有基本养老保险。

对于中国的社保水平,郑功成评价说,近几年是我国社保水平提升最多、惠及民生最广的时期,这不仅体现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基本保障制度已覆盖全国城乡,而且各项保障待遇的标准也大幅度提高。然而,我国社保水平在总体上仍然偏低,社保全口径支出不足GDP的10%,财政性社保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亦不到15%;同时,城乡保障水平差距过大,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低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这些现象决定了我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社保水平,优化保障结构。

褚福灵表示,中国人口众多,又是发展中国家,无论从社保覆盖面还是保障水平看,所取得的成绩都是世界罕见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保制度还比较粗放。我国2011年实施的《社会保险法》才90多条,而德国的《社会法典》像字典一样厚,美国的社会保障法达1400多页。

针对社保中的养老制度,郑秉文指出,有几个衡量指标来评价制度的好坏。第一,充足性。养老金要能够保障人们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第二,可持续性。如果超过了国家的财政承受能力,引发债务危机,就不是好制度。第三,便携性。不应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第四,透明性。例如发布养老保险年度报告等。第五,可负担性。缴费率要让参保人可承受。综合来看,中国养老制度的保障水平还有提升空间,同时应增强便携性与透明性等。

(摘自《人民日报》)

■财富话题I

经济越差 离婚越多

究其原因,房贷危机是促使夫妻劳燕分飞的罪魁祸首。有数据显示,房价的上涨往往伴随着离婚率的攀升。过去人们担心一旦离婚,彼此分到的财产会变少,便选择了凑合过。但房价的上涨与高位运行,保证了离婚能带来可观的收益。另一方面,高额信贷让人们不堪重负,于是便乘信贷危机烧身之前,赶紧离婚,以避免房产被没收。

房贷危机是促使夫妻劳燕分飞的罪魁祸首。有数据显示,房价的上涨往往伴随着离婚率的攀升。

“你离了吗”,这句新时代的流行语已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你最近混得还好吧”的见面问候语。因为,早离早散的“狼”真的来了。

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仅广东省的离婚率就一路走高,由2009年的9.8%、2010年的10.4%,直至2011年的10.9%。2011年一季度,全国离婚率已冲高到14.6%,46.5万对夫妻劳燕分飞。

由此,我们不得不联想,经济危机的威力不断加强,从扫荡金融业开始,逐渐蔓延到实体经济,直至进入单个家庭。

经济下行了,一切能省则省,于是有人总结出十大过冬指南,第一条就是“抱团过冬,死不离婚”,毕竟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更有力量。

但世事总不如人愿,经济危机一来,婚姻危机也随之不可控制地产生,正如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一股强大的离婚潮即将来临。”

这是有史可鉴的,二战后,美国离婚率的第一次激增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正值美国1969—1970年、1973—1975年两次经济危机。1980年,美国经济危机再次爆发,直接促使离婚率于1981年到达顶峰,其中每1000人就有5.3人离婚。随后离婚率开始下滑,到2007年已跌至每1000人中有3.6人离婚,是1970年以来的最低值。2008年11月,金融危机再次不期而至,美国离婚率也已经随之出现激增之势。

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离婚率也比往年提高了13.52%。

当然也有不少人从经济危机中看到了离婚的另一个契机:他们认为经济危机虽然让自己的财产急剧减少,但此时分手的成本也会大幅缩水。于是,乘着危机闹离婚的富豪人数不断创下新高。2008年末,美国传媒大亨萨姆纳·雷石东的发言人宣布,雷石东将与第二任妻子葆拉离婚。当初,雷石东以25亿美元的代价从第一任妻子菲丽斯那里换得自由身,迎娶葆拉,这个纪录至今未被打破。时隔5年,葆拉只获得了500万美元的离婚补偿。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婚姻的试金石,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婚姻终究会在经济危机中坍塌。美国婚姻律师学会主席加里·尼克尔森说:“他们以前总是为谁能留下房子而斗争,现在他们还是争,不过是谁不去做那个‘买死牛的傻瓜’。”

危机除了冲击经济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感情摩擦,导致夫妻离婚。这也印证了“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老话:有钱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偶尔小吵小闹也是生活调料;但没钱的日子,两人不得不降低生活质量,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小事都得计较、盘算。加上生意惨淡,单位裁员,压力增大也增加了矛盾发生的概率,吵得多了,最后也就不欢而散了。

离了再结,结了又离,倒也能给低迷的经济做点贡献。但是,留在家庭成员心中的创伤仍需要和谐的家庭来抚平。其实,正如法国作家蒙田所说,生活的艺术恰恰在于善于利用逆境。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文/李光斗)

■财富人物I

中国最贵 CEO 朱晓林因病辞职 年收入2.35亿

去年12月成功将中国多金属(02133.HK)送往香港资本市场的朱晓林日前因病隐退,辞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CEO)一职。在今年的福布斯中国CEO薪酬榜中,朱晓林曾以2.35亿元人民币的年收入超过联想集团的杨元庆(7872万元)和万科的郁亮(1305万元),在A股及中资H股上市公司中荣登榜首。

中国多金属是云南省最大的铅锌银纯采矿公司,资料显示,花旗集团及阎焱旗下的赛富基金均盘踞其中。

近日中国多金属突然发布公告称,39岁的朱晓林因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而被医生强烈要求停止一切职务,此时距中国多金属上市不足9个月。不过朱晓林仍自愿担任顾问一职,与其共事5年之久的财务总监李涛则接任代理行政总裁。中国多金属表示,由于拥有强大的管理团队,朱晓林辞任不会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辞职后,朱晓林仍间接持有中国多金属7.33%的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多金属提议财务总监任行政总裁并非首次,朱晓林在担任行政总裁之前即为

中国多金属的财务负责人。颇有意思的是,在朱晓林执掌财务期间,中国多金属连年亏损,2010年亏损484万元,去年则巨亏2.44亿元。尽管如此,中国多金属的实际控制人冉小川家族并未亏待朱晓林,2011年朱晓林的薪酬及上市奖励总计达到2.35亿元。

冉氏家族重酬朱晓林并非毫无缘由,在中国多金属筹备赴港上市期间,舆论普遍认为朱晓林将对上市进程起到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重要案例是,2009年中国多金属仅以900万元的代价收购了狮子山矿山,次年又斥资202万元收购了大竹棚矿场为期3年的探矿权,而这两项资产便是中国多金属借以上市的主要资产,尤其是狮子山矿山具备大量的银储量。在整个过程中,朱晓林充分运用了其在财务及矿业方面的专业知识,首先为中国多金属完成了三轮共计9000万美元的早期融资,接着促成中国多金属成功上市并融得10.05亿港元的资金。

资料显示,毕业于西南财大审计系的朱晓林拥有注册会计师



(CPA)执照,先后任职于摩托罗拉、西门子、新希望及川威集团。其中,新希望与川威集团旗下大量的矿业运作经历,令朱晓林成为了西南地区鲜见的财务、矿业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而后,朱晓林分别成功带领中国铁钛、合创国际在香港、新加坡上市。

对朱晓林而言,中国多金属上市可能只是其职业生涯中的一次普通经历,但对于中国多金属而言,朱晓林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尽管中国多金属在朱晓林离职后

作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如委任李涛代理行政总裁,并安排郭志林、雷德君、何敏三人协助李涛,但中国多金属能否顺利步入“后朱晓林”时代尚是未知之数。

此外,朱晓林病愈后会否重返中国多金属,目前也是谜团。近日记者连线中国多金属试图作进一步的了解,但公司方面对此不予置评,并以公司秘书何小碧身在香港及李涛出差在外为由匆忙挂断记者电话。

(摘自《证券时报》文/李雪峰)